

1961

中山文史資料

第三輯

(內部刊物)

1965年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山县委员会編印

1965年6月20日

目 录

- 解放前石岐航运业的概述 廉 坤、洪 奇 (1)
九龍堂等匪幫爆炸同興渡始末記 李澤林 (9)
石岐銀業的回憶 繆文雨、高煥章 (12)
解放前中山县米业和米机业的
情况 黃桂坡、伍允成、黃棧等 (20)
- 七十年来美国基督教同会在中山活动
情况 陳 文 (29)
袁光瞽目院 陳 文 (43)
美国南美浸信会国外傳道部在中山、珠海地区
活动情况简介 陳 文 (49)
英籍主教何明华与翠亨、銀坑难民營 陳 文 (55)
天主教神甫彭錫恩办难嬰院进行間諜活動及其
虐杀婴儿的真相 文 声 (61)
- 淪陷期間“挺三”各支队的走私情況 李澤林 (66)
淪陷前中山反动官吏走私的鱗爪 又 叔 (72)
害人最烈的賭博白鴿票和字胆 鄭勵石 (77)
- 大天二蕭天祥 林 中 (84)
竟进社二十友土匪的猖獗 耀 垣、陳 禹 (91)
林警魂攻打石岐驅逐黃居素的
一幕 耀 垣、陳 禹 (93)

解放前石岐航运业的概述

盧 坤 洪 奇

中山县地勢瀕海，河道縱橫，四通八達，水运交通便利。故貨物产品的交流、运输頻繁。十九世紀50年代，即前清光緒20年前，石岐和各乡的来往交通，有一种稱为“圩艇”，每隔三天的圩期，来往一次。和广州、佛山、江門的交通，是体积大的木船，稱为“乡渡”。均是悬挂风帆，借风駛哩，沒有风时靠人力撐篙划槳。水淺处須登岸牽繩，傍岸而行。故載量不多，行动緩慢。嗣后发展到为車渡。它的体积比較大，行动也省力快捷些，但載运客貨有限，如有大量貨物，要由貨主另雇专船搬运。故当时航运交通，尚多困难。

辛亥后，有了火輪船拖渡，而且有了定期的航行。各綫的航运就有进一步的发展。航行县外的有广州渡、肇庆渡、佛山渡、江門渡、官山渡、高明渡、容良渡、香港渡、澳門渡等。县內的有小榄渡、黃圃渡、茅灣渡、坦洲渡、斗門渡、南水渡等。交通頻繁，帆檣互映，极一时之盛。各綫航运，以广州和香港两綫为主要，現将这两綫的交通概況忆述如下：

广州石岐綫的航務

广州是广东省会和中山的关系甚大，故客貨来往，比其

他航路尤多。光緒初年，有洪晉佳和兄弟瑞洲、卓廷等聯同夥友數人，合資三百兩，開設木渡一艘，承接商店托購和帶運貨物，并接載旅客來往。這種木船稱為桅棒船，往來一次，動輒數天。旅客只鋪一草蓆于船艙里，隨意坐臥，極為侷促。沿途所經各地，均須停船，任客上落，稱為“開街”“埋街”。遇着順風順水，尚不甚吃力，易于到达。倘遇逆風逆水，則須由船員下水登岸，牽繩拖船前进。後來賺了錢就改名為“和合渡”。仍無定期開行，只在開行之前，定了日期，預貼廣告，以為招徠，也無碼頭灣泊。在石岐時，停泊在現時長堤尾河西，在廣州泊在沙基街涌口。

這條航線，後來稱為中省綫；即由石岐開行，經張溪、港口、白花頭、橫逕、裕安圍、沾步、橫瀝、小欖、鶯哥咀轉入順德縣境的大角、二角、桂州海尾、容奇、曹魚石、小黃圃、板沙尾、李家沙、磨磚頭、火燒頭、河滘、紫坭、半步、碧江、三桂、陳村、韦冲、勒竹、東爪壘、陳頭、石壁、龜脊礁、深涌轉入南海縣屬的三山、大尾、南石头到達廣州，全程約100多海哩。由於經過39處地區，均須停船，時間極受阻滯。如不停船伺候乘客，很容易觸怒惡人，受到當地封建勢力的壓迫，挾嫌報怨迫害。而所經之白花頭、鶯哥咀、桂州海尾、磨刀頭、龜脊礁各地，又為盜匪盤踞出沒之區，地勢險要荒僻，時有被劫之虞。

自鴉片戰爭失敗之後，廣州開辟為通商口岸，貨運驟增，小火輪拖帶木船，成為一新生事業。當時有一外省人馬竹若，是陳村紙廠的當事人，他見航運事業有利可圖，乃集資在廣州開設了一艘永生單行，來往廣州石岐，為廣招徠，後改為“洪昌渡”。雇一艘名為發利的火船拖帶。而洪晉佳等所開的和合渡也廣集資本，雇一艘名為富順的火船拖帶，

互相競爭。后来經過調停，双方妥协，各分双单日开行。这是广中綫火船拖帶的碼矢。而这种渡船，要向政府納捐稅，故又稱为“餉渡”。因行动快捷，来往客貨日多，两渡連年获利。但船上設備簡陋，座位凌乱，旅客已多不滿。有一次石岐一个香港富商邓簡的儿子名邓耀黎者搭渡，因船員招呼不好，他发脾气指責船上秩序和設備，船員回答一句：“你想舒適，自己开一隻呀”。邓耀黎認為受到侮辱，同时也覺得航运事業大可获利，返岐后，即用鉅款，购置两艘火船，名为賽星、賽電，新裝花尾渡两艘，名为鴻興、鴻安。与洪昌、和合两渡競爭，互相減收船票价，甚至不收船費，以掠夺生意，招引搭客，因此双方損失甚巨。后来由和合渡的司理洪瑞洲提出和解，互相合作，改为永和公司，重新裝置两艘花尾渡，名为信昌、信恒。船上設備較为舒適，管理也漸完善。船上座位分为殮樓、賬房、大艙三級，殮樓还有几間小房，专为有錢的客人妇女之用，另加收房租。殮樓擺設帆布椅約五、六十座位，賬房大艙，則設鋪草蓆在船板上坐臥。殮樓客人有茶一盞全天供应，也有水洗漱，另收費2毫。大艙客每天只在开飯时供应茶水一次，用一木桶載着，由客人自己帶备的杯取飲，不另收費。供应早殮，可以由旅客点菜。每天于晨晞三、四时开行，晚上四时左右到达，每次船程約十二小时。倘冬天水涸或潮退擋淺，就会阻延到入夜时，始能到埗。又以陳村和港口外白花头两处最为淤塞，常常受擋淺。故渡船要乘潮漲时搶渡，否則潮退被阻。就会被土匪乘机劫掠。

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侵略，國內民族工商业有了发展，当时石岐商会会长曾凤儔，見到商店货运日增，渡船對貨物运费收入甚鉅，就心痒起来。借詞

航商收价过高，向商場提議開設新渡，以集小股为大股的办法，每間商店都有附股，遂以兴发公司名义開設同兴、同发两艘花尾渡，与永和公司竞争，斗争了21个月，又商妥合作，每一个公司开一只渡，永和公司开信昌渡，兴发公司开同兴渡。这是航业兴盛之期。以后逐步踏入厄运了。

旅客和航商的災禍

辛亥革命，各地紛紛組織民軍，后来軍閥做了官，就把民軍解散，毫无安置办法。使散兵游勇，流为盜匪。于是打劫渡船的案件，几成为日常慣見的事。

盜賊糾集党羽，組成“堂口”，寫信向航商勒收“行水”，俗稱为打单信。講妥条件，滿其所慾，可告无事。否則旅客必受其害。

龙濟光入粵之后，把李福林的匪軍部队改編为“保商卫旅營”。由他向各航商进行勒索。強迫各渡船按大小和性質，分为數級，每月繳納固定的經費。花尾渡分为三級，最高的400元，中級150元，最低的100元。每船备价領一枝保商卫旅營旗幟，派數名武裝兵駐船，由船上供給伙食。其他谷船、柴船、缸瓦船以及一切貨船，均要納費領旗，不过勒索比花尾渡較少一点罷了！当时航运有江海难行的怨声。以后滇桂軍入粵驅走龙濟光，變亂頻繁，軍政費的抽剝，有加无止。这些抽剝，表面虽由航商負担，实际都轉嫁到旅客身上。

官兵的摧殘和租懸外國旗：当年反动軍队，每挂名运儀軍队，任意封船。在封用期間沒有租項发給，虽口头上說发給船員伙食，可是口惠而不履行。反将船上物件毀烂。同

时封用时间多久，也无规定，迫得航商行贿請求，又乘机勒索金錢，始予放还，这是航商最苦脑的問題。后有一些无恥的航商竟用錢請求买办阶级，代向沙面外国領事館购买外国旗一面，悬挂在船上。反动官兵只能欺压本国人，對外国人就駭怕，就不敢再加騷扰。以后别的渡船，也相繼效尤。及后肃清了滇桂軍閥，实现国共合作。又成立了輪渡同业公会，始通知各航商不得再悬挂外国旗。由这天起各渡船才恢复插中国旗。在开行之际，一路燃放炮仗，过白鶴潭沙面前，炮仗燃放，尤为热闹，有的船还打鼓敲鑼。航运中人認為这是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帝的一个鮮明印象，至今回忆起来，也認為快事。

盜賊的摧殘：1930年前后數年間，为珠江三角洲盜匪最猖獗横行的时代，南、番、順、中山四县，均有当地的匪幫堂口盤踞。如中山方面，有高佬惠、高佬才、梁騷、梁枝、麦布等組成的五龙堂。另一幫塌头二等組合的九龙堂。港口方面燒猪金（即吳金）、林滿、郭大龙等組合为彩龙堂。梁志帶、潤帶等組合的天子堂等均以打家劫舍，劫掠渡船，勒收行水为务。分向各渡船勒收行水，但堂口多，应付实有困难。故信昌和同兴两渡就积极設備防禦，以为抗拒。除在砲樓布置机关枪，添增护航兵士外，又在船的上下四周，裝配鋼板，各艙加設鐵閘，防护周密。在开行之先，向搭客仔細搜查行李，以防盜匪挾帶槍械，假装旅客搭船潛藏。开行后，即將各艙鐵閘关鎖，派船員看守。賬房另加鋼板鐵閘，緊密关闭，积极和匪幫對抗。

当时匪幫因信昌和同兴两艘渡船，對打单行水，全无答复，且态度强硬，就設計报复，予以剧烈手段對待。拟将同兴渡拖帶的火輪船炸沉，然后洗劫渡船。由五龙堂、九龙堂

两匪帮合作。南海九江匪帮罗鸡洪部下，能制造水雷，爆炸渡船。故派九龙堂匪首塌头二去定制。于是年3月25日早在白花头海面最狭窄河面放下水雷，派匪在岸上掌握电掣，俟拖带火船到达，使之爆炸。谁知这天大雾，岸上匪徒，视线模糊，见船到来，按掣爆炸时，火船已过了，将渡船炸为两截，随即下沉。这次船员旅客，死亡了200余人。同兴渡既以损失惨重，无法复业，而匪徒也毫无所得。可说这是航业和旅客一个空前惨剧。

这时国民党改组，出兵北伐，李济深主持粤政，曾举行过无数次清乡，匪徒始稍为敛迹。又另有航商组织新公司，开设恒安渡。广中线交通不因同兴渡被炸而受到影响。

官僚资本加入竞争：因盗匪的猖獗，航业资本家，多出资和军人恶霸合作。如福军统领李羣，就出名集合资本，开设福兴渡。小榄的大天二袁带开设永泰兴渡，后来改名中山渡。旧有的信昌渡改名悦来渡。新起的恶霸朱克勤开设永生渡。这时广中线共有五艘花尾渡开行。均是新型装备，分为一等和三等，（旧称粮楼和公舱）一律改为上下两格的“碌架床”，座卧舒适，也装有电灯和收音机。这种规模，一直保持至今天。

反动政权对航业的迫害：自改为花尾渡后，每年虽缴纳一次过的税捐，已如上述。自1916年以后，抽剥的名目日多。如广东船政局，则收船牌费，丈量费。广东治河处则收浚河费，广州水上警察厅则收警费，在石岐又有水警费和浚河费、码头费等名目。军事机关则特别凶狂按客货征收加二成的附加军费。尤以官僚军警搭“霸王船”的损失为甚。早期的花尾渡一等客位称为粮楼，只有五、六十个客位。但多为彼辈所占坐，故每水船开行，所收得的水脚不及乘客的半

數。對該等偽軍政人員如胆敢問他買票，他只擱一擱頭，突一突眼便算，如多問一声，就会被打。船員在惡勢力壓迫下，只有忍氣吞聲，这种經常迫害，在解放前夕，尚還存在。

这种迫害航業事例，不特廣中綫航商為獨有，其他航商均是同一命运。

淪陷時花尾渡的末路

在日寇第一次登陸的當時，航商聞耗，恐怕渡船和火輪船落在日寇和漢奸手上，早已紛紛逃赴澳門。及具境淪陷，逃難赴澳的人愈多，租賃房屋，極為困難，露宿騎樓者甚多。故航商將花尾渡借給船員家屬和親朋居住。後來要求借住的人，紛至沓來。乃將渡船擗格，分為小房和床位，租與難民居住，將租錢以維持船員伙食。後來因澳門是咸水海，久泊會受到侵蝕。故將之改裝為貨船或出賣。這就是花尾渡的末路。

抗日戰爭勝利後，只有悅來和民生兩渡，重新裝置，恢復營業，可說是解放前花尾渡的尾聲。

石岐香港綫的航運

石岐赴香港的航程，要經大海。火船和渡均要堅固，始能經受得起海浪波濤。最初是港商黃廣昌，在港集資開設。由黃佩鴻為司理，稱為恒行公司，自置恒通、恒昌兩艘火輪船，利勝、利達兩艘花尾渡。後又有曾鳳儕等組織了國興公司，自置景星、慶雲兩艘火輪船，永昇、永祥兩艘花尾渡，互相競爭。但由岐江經張溪小涌出橫門口出海的一段水程，是由恒利公司用款剗深疏浚，視為專利，不肯給國興公司的。

船通过。因此双方涉訟，国兴公司敗訴，迫得自行剗專東濠，以通海口，各走各路。赴港要經鴨嶺海关查驗征稅，这两个公司就各运手段，贿通海关，求以迅速手續查关，俾得快捷通过。还串同关員走私瞞稅，为主要的收益。两船均以貨物运输为主要。入口以輕工业的舶来品和咸魚海味为大宗。出口以薯芋、鮮果、瓜菜、生猪三鳥土付产品为大宗，业务稳定，获利也大。

抗战时期，反动政权消极抗日，将本县通海航道堵塞，香港渡和輪船，就被无条件征用，滿載大石、凿穿沉沒，以为防阻日艦侵入。这种欺騙世人的所謂抗战措施，只空受損失，對抗战防御起不到絲毫作用。从此以后，因岐关車路通行汽車，對香港的客貨运输，均多由岐从陆运澳，轉赴香港。對香港的輪渡，从未恢复。

澳門綫的航运，由岐江直赴前山，通过海关檢查，即到澳門，航程甚短，貨客的运输无多，只有水客帶运小量貨物，靠瞞稅走私图利，貨物入口的甚少，出口只瓜菜、生猪、三鳥。故對航运起不到大作用。

九龙堂等匪帮爆炸 同兴渡始末記

李澤林

距今三十多年以前，中山县曾发生一件匪帮爆炸同兴渡，溺毙旅客數百人轟动一时的大慘案。

事情发生在一九三零年左右，那时珠江三角洲盜匪十分猖獗。单說中山县三、九区一隅之地就有許多匪帮堂口，嘯聚匪徒多者二、三百人，少者亦數十人。其中較大的堂口有五龍堂、九龍堂、彩龍堂、天子堂等。

五龍堂匪帮是由大霸头匪首梁騷（梁緝峯）、高佬才（林才）、黃圃匪首高佬惠（潘惠）、新沙、新地匪首梁桂、麦伯父（麦布）等所組成。九龍堂匪帮是由浮圩、抱沙、罗松、牛角沙等地匪首塌头义（吳义）、郭叶仔（郭永和）、陳球、馮应、吳容清、关世等所組成。彩龍堂匪帮則是由港口匪首燒猪金（吳金）、林滿、大南沙匪首郭大隆、郭义隆等所組成。而天子堂匪帮則是由梁自带、梁騷仔以及九龍堂的郭叶仔，加上四区涌口門的匪首細佬哥（吳义和）、豆皮十九等所組成。他們經常四出洗劫，杀人放火，擄人勒贖，勒收禾票，不仅为害农村，而且經常截劫客船、为患行旅。

在匪帮盘踞的地方，鬧得烏烟瘴气。地主、富农常购置枪械，遣其子弟当匪，以求立足。风气所及，不少青壯年以当匪为職业，把佩短枪，当綠林，引以为荣。

当时，顺德广东堂的匪首罗鷄洪专以水雷爆炸行劫各江輪渡，非常殘暴。而中山五龍堂和九龍堂的匪首亦打算爆炸行劫香港梧州綫的大火船。但不懂水雷，于是派出小头目郭三珠到罗鷄洪处請得有制造水雷技术的匪徒回浮圩秘密制造。后以香港梧州綫的火船是外国人所办，船堅砲利，不易下手，因而改變主意謀劫行走广州中山綫的同兴渡。参加谋划者为五龙堂的匪首梁騷、高佬才，匪书记黃杞（黃祺仔的父亲），九龙堂的匪首郭叶仔、塌头义等。商議結果，决定約請彩龙堂匪首燒猪金、林滿、郭大隆、郭义隆等共同合作，在中山港口出口不远的百花海面下手。

爆炸行劫的一天是农历三月二十五日。按照港口封建迷信习惯三月二十三日是所謂“天后誕”，地方上照例搭戏棚、請名班、唱大戏。因此，由三月二十日到三月二十四日是港口一年中最热闹的几天，各江輪渡經過港口都敲鑼打鼓，祝賀天后誕辰，各地走抬脚的小販，探亲戚的群众，打荷包的扒手都云集港口，商店張灯結彩，烟館、賭場通宵达旦，是日官匪互相勾結，大排筵席，戏台上下都是当地匪幫的武装，枪械林立。在匪幫盤踞“保护”的地方，他們照例不許扒手活动，被匪幫拿获的扒手，照例用猪籠笠住，綑在戏台上示众。二十四日是大放花炮一天，当地匪幫認為搶得头砲，可卜一年胜利，广场上人山人海，搶砲的人，打得头崩額裂，甚至有开枪轟击者。到二十五日早，众匪幫看完戏后，就出发打劫同兴渡去了。与此同时，另一股匪徒則提前半夜从浮圩出发，互相配合行动。

同兴渡是当时很出名的拖渡，沿途搭客載貨。是日駛經港口时，由港口开街搭渡的十分擠拥。其中包括有拉箱的戏班、来往小欖、容奇、桂州的小販、剛釋放的扒手、探来回

去的羣众約共百多人。因此，这一天同兴渡的搭客特別多，全船共有數百人。当船开出港口砲台后，开街的搭客已經入仓，只有一扒手不准入仓，跔在船头。渡船因防匪关系，出港口后，即將殽樓和大仓的仓門封鎖，搭客不能来往走动，都擠塞在仓内。

参加行劫的各堂口匪徒共有百多人，以九龙堂匪首塌头二为先锋。还有九龙堂的悍匪烟屎东（梁东九）、水瓜二（梁二）及五龙堂的小头目梁广仔等。說起来当时梁广仔与后来任中山县长的張惠长还是契兄弟。據說有一次梁广仔打劫中山四区大环乡，在被擄人中，发现一人是張惠长的亲人，梁即亲自把他送还給張，事为張的父亲張詠廉所賞識，收为契仔。梁平时作恶多端，肆无忌憚，人稱之为梁猛虎。

行劫的匪徒布置埋伏在离港口不远之百花头两岸，水雷則安置在百花头独有一株木棉树對开的海中，由梁广仔負責在大树下擣電掣。本来按計劃是将拖渡的火船炸毀，再行劫拖渡。但恰巧这天下大雾，前面看不清楚，火船拖渡的纜很长，火船过去了，梁广仔才一擣電掣，轟隆一声，有如天崩地塌，火船炸不到，却将拖渡近船头处炸断。被炸断之一截，火船来不及收車，拖离甚远，跔在船头的扒手和船上水手紛紛跳水逃生。此时伏在独木棉树對岸的匪徒即开枪猛烈地扫射，鎖在殽樓和大仓內的搭客无法逃出，又因船的一面受到枪击，搭客惊慌失措擠到另一面，被炸伤的渡船，隨即翻轉沉沒，淹死數百人。其中有六名伪装为搭客准备为劫船内应的匪徒亦被淹毙，其他匪徒一无所获而散。

此轟动一时的历史慘案首先由逃生的扒手在港口傳播开来，但直到事后多天，国民党反动派才派人打捞屍体，从船仓中一具一具拖出，聞說有全家遇难者。

石岐銀業的回憶

繆文雨 高煥章

中山为沿海农产丰富地区，且毗邻港澳，商业发达。鴉片战争之后，出国华侨众多，是著名的侨乡，在外国和港澳经商或做工的約二三十万人，每年侨汇很多，因此石岐銀業經營，过去在各行商业中，跃居前列，仅將記憶所及，作片鱗隻爪的概述。

一、辛亥前銀店的业务

辛亥前石岐商业以錢銀店、当押店的資本为最大，官厅的公私款项和私人游資，均存放其中以收利息。当时存款，均以月息計算，一般为四厘，最高不过六厘。銀店将自己的資本和存款，轉貸于各行商和私人按揭，俗稱“做價”，其主要业务就是按揭汇兑。这种銀店当时石岐共有二十八間，其規模小的也兼營找換。另有一种专營找換的，其資本甚小，业务簡單，稱為錢枱，門口招牌，只标明錢銀找換而已。28間銀号中以阜康、寶慎、誠信和、泗和隆、生发、永昇、义昌、信行、信安、蚨源、生发、永昇发、永生源等在地方上較为有名。它們的經營固須要有雄厚的資本来号召，尤其是要有堂皇宏丽的門面以吸引存款戶。因放債收息，只凭自有的資本，获利无多，利用他人存款，轉手之間，可获厚利。存款付出之利息，不过四厘至六厘，而放債所收利息，

最低八厘，銀根斷絕之时，如农历十一、十二月，可能高至一分五厘而至二分，还需要有相当价值的低押品。所以当时經營銀店，除非东家亏空資本而至崩溃，否則很少倒閉歇业的。故曾有民謠这样說：光棍舖，真好做，陳設酸枝椅八張，迎接貴客來光顧。

二、侨汇的經營和濫发凭票

僑汇的經營：大抵在十九世紀末期，中山已陸續有华僑汇款回家。其汇款是先汇到香港有乡誼的金庄代收，再轉汇石岐的銀店分派給其家人。这种經營僑汇的銀店，稱为“信箱”，是分派华僑函件汇款的專門營業。故俗稱这类函件为“金山信，現时的僑批局，就是从这类信箱的发展而来的。

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华僑汇款，均是金鎊。有大金重8錢8分（老秤），中金重4錢4分，金仔有2錢2分和2錢1分两种，均由原地托汇的銀行将金币用木箱裝載交邮船运至香港金庄。金庄接到这种金山信和汇款，又交由夥伴带回石岐交給有联系的銀店代派。所收手續費为千分之二。大战后漸有以港币轉发。僑眷收到金币，須換了銀币（双毫）行使，故銀店經營僑汇信箱，也兼營找換。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金銀币值价目，比較穩定。大金值毫銀44元，中金22元，金仔值11元——10元5角。起跌差額甚小。但在港的售价比石岐高，故金庄和銀店联結，在接到僑汇金鎊，即在港卖出，由石岐銀号在当地买入分派，僑眷收到后，仍然以較低价目，卖回銀店。故俗稱这种銀店为“剃刀門楣”，出入的人都受到剃刀的刮削。年中获利甚大，已凌駕以放債为业务的大銀舖，从此就奪取了大銀舖的

地位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的青壮年，多被征入伍，生产劳动力减少。旅外的华侨，大为吃香，做工的工价提高，经商的也有鉅大盈利。战后，挾資回国的华侨甚多，留在外国的华侨汇款也逐年增加。

大战前夕的一个时期，金币价目曾达双毫50余元的最高峯。大战时期，日趨下跌，最低时，大金仅值18—19元，金仔仅值4元8毫，黃金每兩值20元左右。同时港币也跌至每10元，值毫銀8元5毫。这對我国的經濟，起了一定的作用。

因僑汇的不断增长，就刺激了銀业的发展。这时就有寶衡、永福利、广和祥、福和盛、祐生、利生、全兴泰、广昇昌、广衡、瑞昇、泗德等新开設的銀店，发展至四十八間。多是归国华侨投資的，尤为特出的是四大公司的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均在石岐開設銀业部。

永安公司是由原有的汇源銀号改組。它的股东多是中山竹秀园乡郭姓族人，因他們多赴檀香山经商做工，年中华僑汇款甚鉅。归僑郭泉、郭乐、郭順等，早在香港和上海開設永安公司，乃分其資金在石岐開設銀业部，派郭灿英为司理，掌握了大部僑汇即現时孙文西路永安僑批局。比較早的还有先施公司銀业部，是由香港先施公司在岐設立的，經營按揭、儲蓄、保險等业务，大量吸收游資，由黃卓南为司理。当时石岐谷米业蓬勃發展，許多投机米商，建筑米仓，大肆囤积壟斷，操縱居奇，将存仓的谷物，以仓单持向銀业部按款，进行再买入。按仓单數量的貨价，可揭到七成現金。不独米业，其他行商也可将貨揭款，因积居奇。这两間銀业部常运用其雄厚的資本，为所欲为。同时，它們又和美

国三藩市、檀香山以及英属的新加坡、澳洲等大埠有直接联系。随时将收入的黄金白银运出香港套利，这时黄金白银尚没有统制，各银店也有这样做。惟营运的数量，则瞠乎其后了。

银行业行和银行业同业公会：我国商业，向以业务区别，各自联成一个集团，名之曰“行”。银店有银行业行，以玄坛神为祖师，订有行规，互相遵守，并负责向本行收集税捐，代向政府缴纳，名为“坐厘”。至1924年石岐银行业行扩大组织，成立银行业同业公会，改订新会章，报由县商会转报政府备案。

1932年（民国21年）在银行业公会楼上（即现时孙文西路217号楼上一连两间）开市买卖黄金、金币、港币。每天早午两市。由各银店的买卖手，俗称为“行街”，负责入市买卖。只凭他个人签字，即作为成盘交易。所谓买卖的都是期单，分为三天、五天、七天的期限，到期即做清算帐。结算盈亏，由所代表的银店负责。但亦有的大银铺，自己设有银仓，稳紫稳打，多用实物成交的。又因投机炒卖的人，不特银业界，其他商店或私人也有通过银店加入炒卖的，故这时银店业务，空前高涨，各店也陆续增加资本。造成一种虚假繁荣的现象。总的来说是华侨汇款日多，游资泛滥于市面，没有正当出路。当时有一个特出反常现象，如英国在香港的汇丰银行，对华侨存款不给利息，租赁银仓存款，还要缴纳仓租。故华侨游资都转向家乡的银业投资。

发出凭单的滥觴和演变：大商店代客开发凭单的办法，来源甚远，银行业和杂行均有。因数额大的买卖，白银携带不便，早期凭单的手续是先将白银交存一间有信誉的殷实商店，由这店照数填发凭单。辛亥前以两数为单位，凭单注明